

何郝炬◎著

霜
月
晓
下

马骥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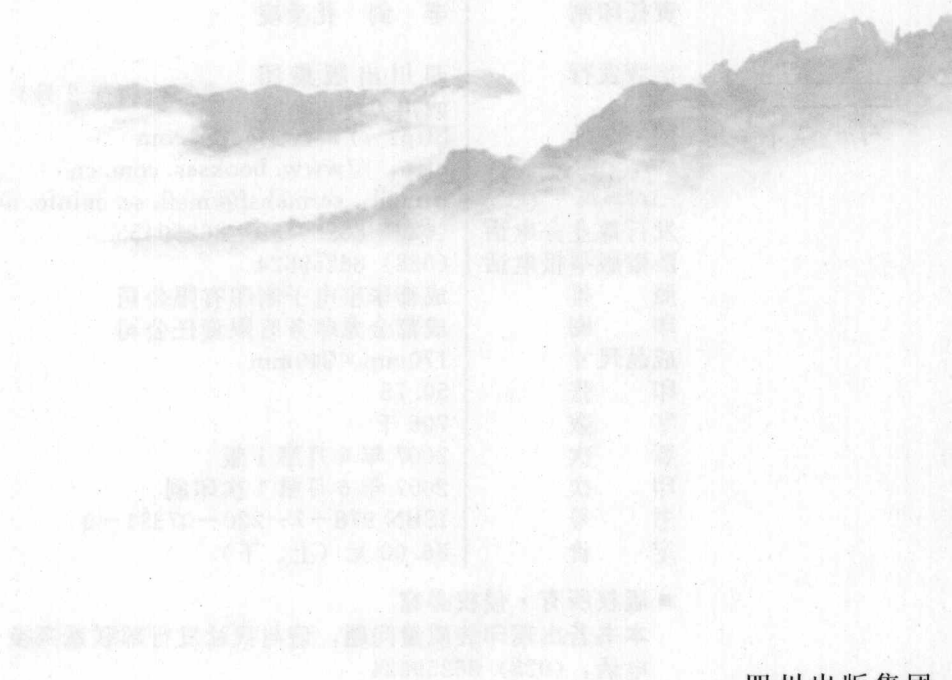


四川出版集团
四川人民出版社

霜飞晓月

(下)

何郝炬◎著



四川出版集团
四川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霜天晓月 (上、下)/何郝炬著. —成都:四川人民出版社, 2007. 5
ISBN 978-7-220-07391-5

I. 霜… II. 何… III. 何郝炬 —自传 IV. K827=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75009 号

SHUANGTIAN XIAOYUE

霜天晓月 (上、下)

何郝炬 著

责任编辑
封面设计
技术设计
责任校对
责任印制

谢 雪
经典记忆
古 蓉
叶 勇
李 剑 孔凌凌

出版发行

四川出版集团 (成都槐树街 2 号)
四川人民出版社

网 址

<http://www.scpph.com>
<http://www.booksss.com.cn>
E-mail: scrmcbf@mail.sc.cninfo.net

发行部业务电话
防盗版举报电话

(028) 86259459 86259455
(028) 86259524

照 排

成都华宇电子制印有限公司

印 刷

成都金龙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成品尺寸

170mm×240mm

印 张

50.75

字 数

706 千

版 次

2007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

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

ISBN 978-7-220-07391-5

定 价

86.00 元 (上、下)

■ 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
电话: (028) 86259624

第六章

严峻考验

待千领兵严以亲，如何冷箭射将军。

憨奸狠毒无宁日，从此斗争更艰辛。

《惊闻黄骅同志遇难》（1943年作）

寥落渔村八大组，秋风萧索晚来迟。

叠遭纷乱非无故，复我河山未有期。

痛定三思问究竟，根寻四处欲何之。

边区今向垦区去，平地又生节外枝。

《八大组》（1943年作）



一、一场争论

春节过去不久，天气还是一阵寒似一阵，一年中最冷的数九寒天还未过去。严峻而冷酷的日子，令人紧张得喘不过气。

老官张家成了地委会的集结点，龙书金、曾旭清和于梅先从齐河转道来此，孙子权则从平禹过来。杨鸿恩牺牲，使专署警卫队也受到损失，孙子权带领机关在平禹休整一段时间，按照事先通知开地委会的约定时间赶过来的。会议的议题只有一个，由我传达区党委、军区对二分区工作的指示，议定今后一段时期对敌斗争与党政工作的方针任务和具体措施。这是王楼战斗后开的第一次地委会，现实情况不允许同主力部队在司令部开会。只有地委小分队和被分成几个分队活动的专署警卫队的一个分队，龙书金、曾旭清率领的只有几十个人，改着便装的直属二大队前来参加。

老官张是个只有七八十户人家的中等村庄，位置较偏。郑家寨据点撤掉后，敌人据点离此较远，在老百姓眼中，没有朱二歪家、于信二庄那样“红”，群众基础却很好，距南边沙河沿也有路可通，住个一天半宿比较安全。这次会议接受上次开会的教训，打算一宿就结束，尽可能保证大家的安全。

人都到齐了，只有邹玉峰还没有到。本来他距离此地最近，经常活动在陵、临公路的南侧原属陵县后划归平原八区的谷、马二庄一带，距此地只有几十里路程。

“他可能赶不到这里。”孙子权刚从平禹那边过来，见到过邹玉峰，听他说最近身体很差，平禹地区斗争又比较紧张，他可能赶不上参加这个会，因此托孙子权代他请假。

曾旭清认为，现在的紧张环境召集开一次会很不容易，徐尚武牺牲后，地委成员还有六人，一人缺席不会影响会议，还是不等邹玉峰

为好。曾旭清的提议，龙书金、孙子权、于梅先都表示赞同，考虑到会议的安全，地委成员不宜集中时间太长，所以会议按时开始。

会议由曾旭清主持，实际上由我唱主角，对于地委下一步的工作，尽管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看法，但在未听到区党委具体指示前，难作系统的考虑，而我在返回的路途中，却有时间作了较多的分析考虑，所以能够率先提出自己的一些设想和意见。

对于区党委指出的以更加隐蔽分散的斗争方式，坚持红旗不倒，青山常在，保存有生力量，合理利用革命两面派乡村政权为抗日军民服务，采取多种形式做好伪军工作等意见，大家都表示赞成与拥护。会议集中在地区本身如何调整力量，以适应当前斗争形势的需要。鉴于目前的困难局面，我之活动应更加分散，但组织力量应更为集中。地区现有的八个县的党组织，七个县政权及县大队，每个县的领导力量和活动地域都不大。在一个大的片区内有两个以上的县级组织各自行动，回旋余地很狭小，领导指挥也不统一。大家主张对此加以调整，齐济合一、平禹合一。撤销临邑县，分别由南、北、西邻县分管。孙子权是想撤销临邑县后，王其元到专署担任主任秘书，接替刚牺牲的杨鸿恩。

曾旭清也很赞成齐济合一、撤销临邑的方案。他认为李聚五在齐河工作很有成效，济阳新设县大队尚未形成，吴鸿宾代县长能力和人气远不如李聚五；两县党组织实际都未建立，由于梅先兼管。两县合一，双方活动地域本来就连在一起，管理也较方便。平禹合一最早也是邹玉峰设想的意见，因为两县地域相连，合并集中，便于领导，并可抽调个别干部到他地工作。

于梅先因此举能够解决齐济党委领导人选，也赞成这个意见，唯对撤销临邑建制有点举棋不定，拿不定主意。

此时我将心中酝酿多时的意见提出来。我认为这是一次大的组织调整，牵扯到六个县域的变动，但又势在必行。要考虑两个关键性的因素：首先是如何保持对敌斗争的主动性，无论如何调整都要有利于对敌斗争，而不是削弱对敌斗争；第二是要考虑组织现状，人手不



够，力量不足，如何尽可能集中一些，形成强有力的领导力量和相应的武装力量。现在齐河与济阳，平原与禹城合二为一，时机较为有利，德县和陵县相距较远，不在一个活动片区，仍然独立坚持斗争，以上大家意见一致。目前关键是临邑一个县怎么办？事实上它已被分割成三块，县府、县大队在全县的活动已很困难，而临邑正处于二分区的中心位置，是敌我双方争夺的焦点所在，谁控制了这个中心点，谁就掌握了斗争的主动权。所以尽管我方活动十分困难，如果自己撤销临邑建制，就无异于承认我们在临邑已不能立足，使人们产生“红旗倒了”之感；反过来说划给各县，实际上都是这些县的边沿区，县府、县大队也不会经常前往活动，会因此放松了与临邑敌伪的斗争。在此我提一个折中的方案，即西南两方暂交给齐济、平禹两县管理；以宿安镇为中心的城东北至城北这一片，是三片中最大的一片，设立临北办事处，名义上仍为临邑抗日政府，以保留临邑这个牌子。下辖三个行政区，其任务是坚持临邑东北到城北一片地区的斗争。这对于坚持二分区中心地点的斗争是有利的。临北的干部由原临邑县部分干部和陵县抽调来的干部组成，武装力量则抽调陵县五区区队大部 and 六区区队、宿安区队组成临北游击大队，原临邑县大队改为济阳县大队，县党政干部主要充实济阳县，一部分留在临北区。

这个方案提出后，于梅先首先表示赞同，龙书金也表示同意，孙子权对此稍有疑问，但因为只是多保留一个县建制，不影响王其元调专署，因此也不再坚持。最后曾旭清将大家意见统一，就此决定下来，并将各县的主要干部作了相应调整，他们是：齐济县长李聚五、副县长吴鸿宾，调平原县工委书记王西平任齐济县工委书记；平禹县长周今生、副县长郭毓芬，县委书记周今生、副书记王林华；临北工委书记国珍、副书记刘润生，委员王战亭、张健（原临邑工委宣传部长），临北办主任巩铁锋；陵县县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马冲（原临邑县委副书记），县长王二一。王其元正式调专署任秘书长。

这个会开到下半夜，大家情绪很高，司令部管理员还在村里搞到一点干酒，五人中四个都喝了好几小杯，尽管没有酒药，但还是觉得

人口喷香。因为已很久没开过会了，难得大家相聚在一起，聆听区委对工作的指示，议定了全区的政权建制和干部调整的大事，更让大家兴致勃勃，对今后的工作充满信心。会议商定，会后立即分别到各县传达会议精神，部署工作，一俟区党委电报批准我们的调整方案后，即按此进行工作。

我已确定次日径往德平、德县边境，向两县党、工委及李玉池等同志传达区党委的指示及地委的有关决议，然后再返回陵县，并着手组建临北工委的有关事宜，龙书金、曾旭清、于梅先则仍经平禹返回齐、济，孙子权直接回平禹。

我从老官张家转移到赵马拉家，这里是离罗院据点只有十来里远的一个回民村庄，因为离据点近，老早就成为一个两面派政权，有几个管事专门应付敌寇和汉奸。但是在村里的一切抗日活动全是公开的，不管抗日武装人员还是革命干部，谁住在这里，全村的人都会为他保密，保护他的安全。这个村自然也是李玉池的回民救国会的基础村庄，李玉池隔不多久就要跑来一趟，村里回民救国会主任回宝仁，实际就是村里的当家人。我来到这个村庄，可以放心地歇上一宿，第二天又来到德平境内的张庄，给回民大队、津浦支队和德平工委的同志们传达并部署下一步的工作，然后再回到德县境内，和刘秀峰、曹茂先、武连鹏、刘之光、杨国栋等人一起研究德县的工作。就在我和李玉池等同志刚谈完工作，其他同志都已离去，我准备再和他单独谈谈我活动中心区，以及边沿地区一些回民村庄的工作进展情况时，地委交通站同志陪同张肥一齐赶来。张肥带来从谷、马二庄那里送来的紧急信件。此信注明十万火急，要求即刻送到我处，不得延误。

“什么事情会这么紧急？”我当着李玉池的面拆开了信件。原来是专门写给我的一封较长的信，由曾旭清领头签名，龙书金、孙子权、于梅先、邹玉峰也都签了名字。

“老官张会后，我们几人即行南去，在谷、马二庄见到邹玉峰同志，共同感到在老官张会议时，未能敞开意见，将议题研究透彻，以致影响决定问题的正确性，遂继续开会，重新讨论。大家认为，鉴于



二分区当前复杂尖锐的斗争形势，精简合并县级机构，有利于更加灵活机动地坚持斗争。临邑地区环境比其他县区更为突出，县里已不能在各区正常活动，将临邑属地分别划给几个县管辖，对临邑及相邻各县均有好处，西、南两面已经确定由平禹、齐济管理，北面亦不例外。如组建临北工委及政权办事处，实际上只管辖东、北面部分地区，力量比较薄弱，起不到人们所期望的作用，不宜设立。且拟议中担任临北领导的几个干部，恐难以胜任工作，只凭地委个别领导人的一时印象提拔，旁人多有议论，影响不好，现不设临北工委，此事可不议。”

“会议重新议定，全区保留平禹、齐济、陵县、德县四个县建制，德平仍保留党工委，加上四个县县委、县级党委为五个，县级领导干部配备，重新确定名单，除了临北工委不再设立，其他领导干部基本维持原来的任命。”

信最后提到：“大家在讨论中对你的民主作风、干部政策方面，有一些意见，希望你今后能够引起注意。现将重新决定的事项，电报区党委批准后执行，特专函送你处，请按会议通过的口径向下传达，免致差错。”

我脑子里猛然感到一阵剧烈的震荡，简直没有想到，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？显然矛头是对准我来的。会议已经决定的事怎么会错了呢？就算错了，怎么能将一切错误都集中在我一人身上？这一天的会议竟成了我一个人的事？临邑县的撤与不撤，对几个干部的使用，难道真的是我错了吗？

待回过神来，才发现李玉池和张肥待在一旁。他俩似乎已觉察到地委一定有什么重大事情。李玉池漫不经心地说：“大哥，你好像有急事要办，我是不是先走一步，有些事另找时间来谈？”

我猛然惊醒，怎么竟然把和李玉池谈话的事给忘了，而且还真想不起要谈什么事，我本能地回答他：“你先等一等，让我想一想，明天一早谈过以后你再走吧，我还想找李金德去完成一项任务，明天一齐说吧。”

其实我真没想到要李金德干什么去，明天到底该谈什么，脑子里完全是一片空白。

这一宿，我思潮起伏，彻夜未眠。这是一年间，我遭受的第二次严重批评。第一次是黄骅事先向我打过招呼，思想上有准备，尽管有些意见我始料不及，最后没觉得自己受了委屈，只是责备自己认识迟钝，能力不济，幼稚无知。但这一次却完全不一样，恍惚间觉得自己受到很大的委屈。这次会议不是我主持的，我只是传达区党委对地区工作的指示和提出的意见，而曾旭清的来信，言外之意是没有将会议开好，而且归咎于我的民主作风，干部政策上有问题，事实上是否定了会议的决定，作了另一个决定，并把决策错误的责任加在我的头上，这叫我怎么能接受呢？

反过来再想一想，地委的几个同志也都在信上签了名，表示出对我有很多意见，我是否应该扪心自问，认真反思？在地委内部大多数同志意见一致的情况下，我是否应该接受这个现实，以“顾全大局”？

“算了吧，委屈就委屈，大局是第一位的嘛，事情就此罢了。”脑子似乎渐渐平静下来，但总有一种“意犹未尽”之感。就算真是我的意见错了，总是大家的意见起了作用，为什么要让我一个人来承受这个错误呢？

“我提出的意见以及会上形成的决议，到底错没错呢？”我不停地问自己。这个决定事关对敌斗争的重大问题，决定错了必然会出现重大损失，但如果对了呢？

思前想后，诸多问题集中到“临邑”这一点上。“临邑撤县”是会议议题的中心。是把整个县的建制撤掉，还是保留“临北工委”？“为什么仅仅凭这一点就否决了原来的会议决定？而且重新开会，重新作出决定？这符合党的组织原则吗？”

“不！这绝不是一个小问题，而是事关全局的重大原则问题！”我主张的是：尽一切努力坚守临邑这个阵地，即使不能保持完整的临邑地域，也要在临邑境内保持住一面旗子，不向敌伪示弱、退却，向人民宣布“红旗不倒，青山常在”，这何错之有？而完全撤销临邑县，

则可能给敌人甚至于给我们的人民以“抗日政府保不住了”的错误信号。保留临北旗帜，虽只解决了城北、城东北这一块的问题，但却留住了和敌伪面对面斗争的旗帜力量。是撤是留，自然会导致两种不同的结果。

经过反复的比较思考，我最终认定第一天会议的决议是正确的。第二天会议决定，虽然仍保留了第一天决议的大部分内容，但却抽出有关临邑这部分重新决定，恰恰是问题的关键所在。不能说他们的意见是错误的，但起码没有第一天决议意见那样完整。且以此否定第一天会议的决定，难道不是一次错误的决策吗？

几位同志的来信，表明了对临邑问题的不同看法，也更多地表达了对我有意见，其实质是后者影响前者。我该怎么办？是坚持第一天的正确主张，还是服从大家的意见？如果我坚持己见，继续争执下去，或许会增加大家对我的反感和意见，我将何以自处？

不，不能因为个人得失，而放弃对正确意见的坚持，听任不利于革命的意见得以实现，这不是一个共产党人应有的态度。回头又想，地委已电报区党委，要想改变也来不及了。

瞻前顾后，反反复复，老是拿不定主意。我强压内心的激荡，抱头冥思苦想，力图使自己的情绪能够平静下来。然而我不可能做到，这么重大的问题，怎能就此了结呢？

我横下心来，即使得罪了地委的全体同志，并因此受到组织上的严肃处理，我也要向区党委反映并坚持自己的意见，争取区党委在批准报告之前看见我的意见。这可能是将自己置于险境的冒险之举，但我已决定不予计较了。

次晨，我告诉李玉池，我有紧急的事要处理，谈回民村庄工作另约时间。我还打算让李金德跑一趟新海，向区党委送去一封紧急的信。

“没问题，准行！”李玉池回答得很干脆，“金德这人你了解，遇事沉着勇敢，不怕疲劳，你给他三天时间完成任务，他只会提前，决不会延后完成任务，如工作需要，他不进庄子，啃几颗老玉米，也不

会耽误办的事。”

“那就好嘛，反正去新海这条路，咱们都去过了，我想来想去，只有他能办此事了。”

李玉池随即离去，要李金德马上来此。我仍留在村里，尹寿和、蔡玉田轮流在外面站岗。主意已定，我凝神片刻，奋笔疾书，一口气写了一封长信：

旭清同志并地委诸同志：

紧急快件收悉。

我怀着十分沉重的心情向你们陈述此时此刻我内心的感受 and 不安。完全没有想到，在头一天刚开罢地委会，作出有关当前斗争的重大问题的决定之后，又召开了同一议题的又一次地委会，作出了改变上述决定的另一个决定，并且指出第一天会议作出的决定是不适当的，与我的民主作风以及干部使用上的错误观点有关……

同志们对我的作风和政策观点提出严正的批评意见，我应当虚心接受，并且认真检查自己，不应当找理由为自己开脱。不过摆在面前的中心问题不是作风问题，而是关系到二分区斗争的大局问题。其中大部分意见，两次会议都一致，主要集中在临邑划县这一点上。关键是对敌人重点压制地区是撤出、退却还是坚持阵地，保持抗战旗帜不倒的问题。有关临邑划县并保留临北的旗帜和坚持斗争的意见是我提出来的，并在会议上经过全体讨论同意之后形成决议的，这是既从坚持抗战大局出发，又考虑了临邑县城被分割的实际情况后提出的意见。我坚持认为，这个意见是对的，而不是什么不适当的意见，也不能以此指责我的民主作风。因为这个意见提出以后，是经过大家讨论定下来的，我只是参加会议的一个成员，尽我自己的责任，谈不上我是以己之见强加于大家头上；我更以为，如因此对我的作风政策方面有意见而重新开会，否定第一天所作的决议，岂不是本末倒置，因噎废食



吗？经过反复思量，觉得不能因为顾忌到同志们对我的批评，而对大局攸关的问题缄口沉默。因为我们都是共产党员，对党的事业的忠诚，以及自己的良知和责任感，都在召唤我不能违心地接受不应该接受的事，不能轻易放弃原则和意见。

关于使用干部，我可能对干部了解不深、不准、不全，近来我已有所感。但是上次会上提到的干部使用，主要着眼于当前斗争的实际情况的需要，我不认为这是任人唯亲。说实在的，我来此已经一年，接触的都是战火中出生入死，摸爬滚打，对自己的性命在所不惜的好同志，彼此相见，自然是热情友爱，常相关照，这怎能说是“任人唯亲”呢？来信中提到有关干部的能力、水平不能称职，不能担负重责等。我以为称职与否是相对的，是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的。二分区工作开展得晚，干部成长自然也晚。在现有领导干部中缺位或不胜任的为数不少，我们几次要求区党委从老区调干部支援，但一年来只调了德县县长曹茂先一人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总不能因为干部少而弱，放弃许多应该进行的工作吧。我们知道，在我们的友邻冀鲁豫地区，他们的干部是怎么配备的呢？张玺、段君毅^①这样的同志，他们曾经担任区党委书记、行署主任，现在都在担任地委书记，而在我们这里，像郝炬这样的水平也被安排在相同的岗位上，两者的距离简直不可同日而语。然而现实就是如此，党把你放在这个岗位上，总不能因为这个干部能力差，不称职就撂挑子不干工作，那将会给党和人民造成更大的损失呀！此刻我想此信进入你们眼帘之时，地委向区党委的请示报告可能已获批准，这样我的这些意见，恐已毫

^① 段君毅（1910～2004年），河南范县人。曾参加一二·九运动。193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抗日战争爆发后赴延安。1938年赴山东，参与领导建立鲁西抗日根据地。解放战争中参加挺进大别山和渡江作战。先后担任中原野战军纵队政委、中共鄂豫区党委书记、第二野战军后勤司令兼政治委员。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、中共四川省委书记、铁道部部长等职。

无实际意义。考虑再三，我即以此信及你们的来信全文照抄一字不变由交通员径送区党委。

另附短信，全文为：

区党委：

地委此次开会（邹玉峰因事缺席）传达区党委指示，作出调整县级组织机构，以适应面临的斗争形势的决议。次日地委在平禹重新开会（郝炬未通知到会），改变原来的决议，并已电报区党委。鉴于决议内容直接关联地区斗争大局，我重新向地委提出意见，大概已不可能赶上区党委批准报告之时。为此特将地委来信及我致地委同志的信一并抄录，紧急送呈区党委审查，如有不当，甘愿接受党给予的任何处分。

请原谅我这一举动的鲁莽和不当，我愿意接受同志们对我的最严厉的批评。

临楮匆匆。谨致

革命的敬礼！

郝炬

把这两封信分别写完，交李金德发出后，我已经整整两宿未曾合眼，虽仍毫无倦意，倒是脑子里一下变得空荡荡的，却又忽然觉得一身轻松。压在心上的沉重包袱已不见踪影。原打算去德县工委后即回陵县，这时才发现不用急着回去，因为区党委对二分区的有关指示，我回陵县时已先对县委谈过，地委的决议现在又无法传达，我正好趁此在德县多停几日，再到新开拓的五区地界亲睹那里的情况。

1942年夏秋之际，在我活动中心区异常困难的情况下，刘秀峰支持刘之光的提议，由他潜回家乡，凭借其家庭在当地的社会关系，做了当地联庄会和据点里维持会某些头面人物的工作，达成默契之后，由小武装分队逐渐渗入站住脚跟，几个月时间已经建立起抗日区



公所，并有了自己的区武装队伍。这对于处在艰苦残酷环境中的德县、陵县、平禹等县来说，无异于能经常进入活动，在一部分村庄已能掌握村里的管事，开展一些抗日宣传活动，在犬牙交错的斗争中，取得主动权。这也证明区党委传达的上级领导关于“敌人向我根据地打进来，我们则选择有利条件，打到敌人控制的地区去。以牙还牙，以血还血，东方不亮西方亮”这一指示对德县再恰当不过了。不过还不能说是“东方不亮”，烈火在东部几个县区照样熊熊燃烧，未被敌人扑灭，西方却真的亮起来了。目前只是一个开始，只有五区这么一小点。德县还有几个区在等待我们去点亮，让它们也燃起熊熊火焰。

到五区村里一看，真令人振奋。这一片村庄密集，土地肥沃，和八、九区那边的盐碱地和稀疏的村落相比，反差很大。就在我们住的一个小村旁边，有一个百户人家的将军寨子，旁边有朱明王朝开国大将常遇春的墓地，据说他领军北征元室，至此病逝，年仅四十。可见这冀鲁大平原自古就是兵家常来常往之地。现在的小环境倒还平静，土桥据点有为数不多的伪军，一般村庄都只有联庄会活动。等到青纱帐起来后，我们就可以开展活动，秋季以后，争取通过道沟把村庄之间连成一片。刘之光现在是以工委委员的身份具体负责这个区的工作，实际上兼任五区的区委书记。

令我高兴的是，我对刘之光的能力没有看错，在开拓五区的工作上，他发挥了很好的作用。虽然他利用了家乡社会关系的有利条件，但更主要的是他本人办事有魄力，遇事敏锐，敢于主动请缨，敢于承担责任。与和他一同出来工作的张肥、杨国栋相比，他们都是优秀的青年干部，但张肥、杨国栋两人性情沉静，不事张扬，埋头苦干，适宜做党的组织工作和群众工作。我们过去曾认为刘之光华而不实，现在看来，他个性鲜明，敢于提出问题，大胆干工作，勇于给自己加担子，迅速开创新局面。在战争环境下，这样的干部更得力，比起前两人来，似乎更胜一筹。

我还以为刘之光在五区开展工作，刘秀峰同样功不可没，尽管平素他工作办法不多，德县工作进展缓慢，我对他时有批评，但在刘之

光建议开拓五区这个问题上，他积极支持，向地委报告并付诸实施，在最短的时间里，办成了一件大好事。

鬼子兵大多集中于德州城里，只控制鲁北附近几县的基点，并不常在德县村庄里活动。东边只有边临镇是鬼子前哨的强力据点，目标瞄准我方在七、八区的中心区域，有时也配合德平、宁津几处敌伪的活动。可以说，五区这一片是敌伪军控制的空白地段。

刘之光认为几年来我们一直未向该地区发展，敌伪自以为这里是他们的安全领地，不大过问。今后我们活动的影响加大，引起敌人注意后，可能会和七、八区处于同样的状态之下。

我说：“这是无法避免的问题，只是时间早晚而已。我们当然要争取时间，发展这个新点，使它和东部互成犄角，互相支持，使德县地区的抗日活动形势得以改观。但是眼前这个地方还不具备较大的武装力量活动的条件，这里一马平川，没有像中心区那样的道沟，打起仗来处在一片开阔地上，转移的难度很大。”

刘之光说：“已经考虑到这个问题。现在大部队自然不好行动，所以只能是一个隐蔽的游击区。我们也想开挖道沟，以创造部队进入的条件，但在冬春之际，暂时还不可能抓这件事。”

地委曾几次向区党委反映，刘秀峰只是代理工委书记，德县县委缺少一位能够掌握全盘、积极开展对敌斗争的主要领导人。最近区党委已经同意，从一分区调鬲津县委书记时进担任此职，刘秀峰只能担任新的县委副书记，这是为了加强德县的领导力量并正式成立党的县委，以代替原来临时性的工委，并不涉及刘秀峰本人的上或下问题。我一直认为，这样处理是正确的，也相信刘秀峰本人能够正确对待。这次和刘秀峰个别交谈时，他那开朗豁达的胸怀，更让我高兴，不禁联想到自己的经历，不是一样的吗？在革命工作中，干部要做到能上也能下，一切都是革命的需要，也是很正常的事嘛。再想到几天前发生的事，无论是地委多数人对我的意见，或是因为直接上书区党委，而把自己放在和地委多数同志的对立面上，我都可能会——不！一定会被撤离现在的工作岗位。这又有什么呢？我不禁暗问自己，在临邑



建置问题上，我能不能以对党、对抗战事业负责的态度，做自己应该做的事，这才是对我的党性的严格考验。只要能继续为党，为革命事业尽自己的一份微力，我不会有任​​何怨言。

*

从五区转到八区地界，李玉池已率领回民大队来到这里。按他的说法，是完成上次未完的谈话。李金德已经回到回民大队，他已经完成了我交给他的任务。

这真让我惊讶，李金德走完了大致要十天才能往返的路程！

李玉池说，你专门交给他的紧急任务，他自然是拼死拼活地去完成！你没看见，他回到队上，说着话都像在睡觉，还要急着向你报告信已送到，我看实在没法，只好让他骑上毛驴，两人在旁边扶着他，立马赶到你这里来。

“真是好样的，金德同志！”我的眼睛忍不住有点发酸，“你是怎么走过来的？”

李金德平时言语不多，这次说起来还是那么简单。上次跟小队一起跑大、小山，已经认得路了，他一个人用不着像小队行军那样绕来绕去，自个儿找近路走，找沿途的回民村庄歇脚，也好打听路途中有什么情况，实在赶不上村庄，就采取老办法，在漫洼地里过夜，啃几口冷饽饽，天明时再跑。就这样三天的路程，两天就跑到了，上了南望子，交了信。袁振留他吃饭，让他歇两天再走，他怕我等他的消息，当天就回到岸上，马上赶回来。

李金德一副风尘仆仆的模样，盖头上沾满了灰沙，颜色早已由白色变成黑黄色，脸上胡子拉碴，人显得更黑更瘦，眼睛却仍旧大大的，炯炯有神。

“你太辛苦了，真不知该如何感谢你！”我十分激动，不禁重复说。

李玉池在一旁插嘴：“送这么紧急的信，也不扯个回销。其实歇上一天半天，得到一个回信，那该多好呀！”

“这没必要，也不可能扯回销！”我说。他怎能知道这是一封不能